

从隔离走向融合：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剖析及破解

——以长春市为例^①

刘 杰

内容摘要：失地农民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兴群体，在与城市市民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社群隔离现象，这种社群隔离呈现出经济性隔离、自愿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三大层面，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隔离走向融合是破解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群隔离 社会融合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在这 30 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逐渐形成三大群体：城市市民、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在当前的户籍制度和各种城市管理制度的限制下，农民工终归属于城市的过客，而失地农民则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被城市管理者纳入城市市民的管理范畴。从这个意义上失地农民可视为城市市民群体的组成部分。当前学术界对于城市社会的研究主要有两条思路 and 两套不同的分析范式：一是将当代城市社会视为一种由不同个人与组织的互动所构成的场域，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范式来进行理解^②，这种研究思路和分析范式是当前学术界分析城市社会的主流；二是以城市邻里政治为切入点，从“人的行动”的视角来理解城市社会生活，以一种强调分化的行动者及其互动的分析框架来观察和分析城市社会，采用这套研究理路和分析范式的学者以桂勇为代表。两种研究思路和分析范式都是在个体互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层面展开研究，当前学术界对于城市社会群体之间关系和互动的研究仅限于城市原有居民之间阶层分异的探讨。

失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市民的新兴群体，当前学术界对失地农民的研究集中于失地农民征地补偿的不公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等方面。本文在对长春市失地农民经验调查的基础上，致力于探讨失地农民这一城市新兴群体与原有城市居民之间的群体关系，侧重于研究原有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之间的相互

^① 本研究为吉林大学“985”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81213）。本文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来自于作者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郑沪生研究员合作的吉林省“十一五”规划课题“吉林省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07148）。本文是在作者硕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此特别感谢导师田毅鹏教授的悉心指导。

^② 任远、桂勇著作“邻里空间”种的序言一. 邻里空间【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排斥和隔离，以社群隔离为研究视角，揭示当前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现象表征，探寻这种社群隔离现象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在社会融合的理论视域下寻求这种城市社会存在的社群隔离问题的破解途径。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隔离的研究由来已久。黄怡在《城市居住隔离及其研究进程》一文中对国外学界对隔离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回顾。^①她认为隔离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对 19 世纪曼彻斯特社会居住空间模式的研究，研究学派主要的有人类生态学、都市人类学及空间经济学等。同时，黄怡总结了国外关于隔离问题研究的三个领域或类型。

笔者综合国外关于社群隔离的研究成果，发现有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首先是文化的视角。这种视角的主要代表学派是都市人类学派，其中以刘易斯为代表人物。在都市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刘易斯定义并分析了都市化、工业化国家最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②。他通过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哥贫民窟居民进行一系列研究后认为，当一群人几代都处于贫困状态的时候，就会造成贫困者同主流社会的相对分隔，从而产生一种适应这种贫困状况的贫困文化。这种贫困文化的特点包括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而且它可以通过贫困群体内部的交往确保自身永久存在，并表现为世代传递。

更多的学者是从财富和权力的视角分析社群隔离现象。都市人类学派的伯吉斯在研究芝加哥的居住分异和邻里变化时，引入了生态学中的侵入、支配和演替的概念，并以观察特定类型社区的区位及其空间扩展为基础来确认一个城市的空间结构，发现其由一系列同心的环带构成^③。伯吉斯认为个人之间为了城市中理想的区位而进行非个人的竞争，这种竞争基本上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其结果就是使土地租金产生一种特征化的模式。不同地点和条件的土地租金不一样，又因为不同的人支付租金的能力不同，从而在不同的类型的人群之间造成了隔离。在他看来，经济分异是导致居住隔离的基本原因。安东尼·奥罗姆和陈向明也是此观

^①黄怡. 城市居住隔离及其研究进程[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 (5) : 65-71.

^②转引自李强. 贫困文化之研究【J】. 天津社会科学, 1989 (01): 74-77

^③ 【法】阿兰·库隆. 芝加哥学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点的持有者，他们认为，财富和上层阶级的特权不仅表现在工作地点的结果上，也表现在大都市内阶级和资源的分配方面：较穷的那一部分人口不可避免地居住在城市中最差的区域，而较富裕的阶层则有能力搬往更昂贵的区域居住。独立于阶级之外，种族和民族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城市中心城区几乎成为黑人的领地，原因之一是受美国特殊的历史和种族隔离的影响，另外则是因为较新的高收入工作从中心城区转移到了城市边缘郊区^①。米歇尔·米绍在分析 2005 年法国巴黎大骚乱的原因时指出，社会分裂和社会排斥是造成法国贫民窟的原因所在，贫民窟是各个社会集团针对那些在相同的社会上升流动中生活方式不同、收入不同、人际关系不同或者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施行的躲避战略。这种躲避战略的结果就是在空间上就形成了富人聚集区和面积越来越大的穷人聚集区。这种分化是以土地价格和社会地位为依附。^②大卫·哈维认为财富和权力的地理悬殊加速形成了长期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大都会世界。^③既然财力各不相同，那结果就是把城市分割成一片片拼凑物，相对富有的人努力在传播贫穷和堕落的海洋中保护自己。总的结果就是都市空间的分裂和碎片化、是多样化中社会性的缺失以及对城市其余地区的局部保护性姿态。

从公共政策的视角追溯社群隔离的原因是国外学术界一以贯之的话题。早期的学者大多从种族隔离政策来分析美国的社群隔离现象，研究欧洲社群隔离的学者更是从欧洲的福利政策角度进行分析。安东尼·奥罗姆、米歇尔·米绍、大卫·哈维等均提到了公共政策对社群隔离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涉及到就业政策和福利分配政策。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更是认为，财政重商主义对“居住隔离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地理分布有很重要的意义”^④，他指出，由于法律和制度框架以及社会政治进程导致了空间上的不平等。威尔逊强调聚居区特有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经济机会之间动态的交互作用，^⑤认为需要考虑各种效应，其中不仅有美国经济组织的变化所带来的效应，而且也包括人口变迁的效应，以及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变化的效应。他指出，当代的许多种族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穷人陷身其中的问题，都源于广泛的社会组织问题。社会组织指的是社会的运行安排，“讨论社会

^①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M].北京：世界出版社，2005.

^② 【法】米歇尔·米绍.法国城市规划 40 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48-160.

^③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 【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⑤ 【美】威尔逊.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组织的问题，就是讨论现存的运行安排（包括从协调关系和行动的方式，到技术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诸多方面）对社会中特定群体的不利影响，即便其他群体可能不受影响，甚或从这些安排中获益。”从这些观点出发，威尔逊认为公共政策的不平等分配是社群隔离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提出要用综合改革计划来改变这种社群隔离的现状。他说，“综合的改革计划充分认识到社会性组织与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生活机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换言之，这种计划既能增强贫困少数民族成员的人力资本特质，又能扩展一般社会和经济体系中的机会结构以促进社会流动。”

国内关于社群隔离问题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郭星华对社群隔离的定义及其测量做了一个总结。他认为社群隔离是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社群隔离理论主要研究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为什么会产生社群隔离；其二，社群隔离对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三，如何测量社群隔离的程度。他指出，社会学家和区位学家将社群隔离分为三种类型，即区位性隔离、自愿性隔离、非自愿性隔离。最后，他指出社群隔离可以用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两个指标来测量。^①

在社群隔离方面研究比较彻底的是城市地理学中关于居住隔离的研究，其中尤以黄怡的居住隔离研究为典型。黄怡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居住隔离的概念、国内外研究的进程以及测量指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国内关于社群隔离问题研究的有限文献集中于对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社群隔离状态及原因的探讨。主要有郭星华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和对城市民工群体的自愿性隔离的探讨^②，郑传贵关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群隔离产生原因、危害及对策的论述^③，吕露光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居住空间分异和社会隔离现象的探讨^④等等。最近中南大学的潘泽泉从空间的视角论述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及城市市民的隔离现状。

（二）研究方法

^① 郭星华.社群隔离及其测量[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23-25

^② 郭星华.从乡村到都市——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江海学刊.2004(3): 91-98.

^③ 郑传贵.当前我国城市社群隔离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J].城市问题.2003(6): 72-75.

^④ 吕露光.从分异隔离走向和谐交往——城市社会交往研究[J].学术界.2005(3): 106-114.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法,以长春市失地农民为个案,通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本次调查采取多段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首先将长春市六个行政区划和两个开发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利用立意抽样方法,选择失地农民比较集中的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朝阳区、南关区和宽城区作为主要调查区域。次级抽样单位是街道办事处,利用系统抽样法,从主要调查区域选择一个社区作为具体调查区域,分别为朝阳区双德街道办事处下辖的 S 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下辖的 F 社区(由原双德乡前进村、光辉村组成)、宽城区兴业街道办事处下辖的 T 新村(由原奋进乡 T 村组成)、南关区明珠街道办事处下辖的 X 社区(由原幸福乡黑嘴子村为主的若干村组成)、鸿城街道办事处下辖的 W 小区(由原幸福乡刁家山、肖家堡、红星等村组成)、J 二区(由原幸福乡东风村元东社组成)。最后,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抽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00 份,采用当面访问法,回收问卷 5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48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

图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频数	百分比	样本数
性别	男性	192	59.4	478
	女性	284	40.2	
年龄	18 岁以下	2	0.4	474
	18-25 岁	14	3.0	
	26-35 岁	32	6.8	
	36-45 岁	74	15.6	
	46-59 岁	196	41.4	
	60 岁以上	156	32.9	
文化程度	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	140	30.6	458
	小学	98	21.4	
	初中	158	34.5	
	高中(中专)	52	11.4	
	大专	4	0.9	
	本科及以上	6	1.3	
现在的户籍关系	农村户口	208	43.9	474
	城镇户口	238	50.2	
	其他类户口	28	5.9	
农村生活年限	没有	16	3.4	470
	5 年以下	12	2.6	
	5-10 年	18	3.8	
	10 年以上	424	90.2	

从调查总体情况看：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年龄在 46 岁以上的中老年失地农民，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 74.3%，他们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和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的为主，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34.5%和 30.6%。被调查对象中生活在农村 10 年以上的占 90.2%，1999 年前被征地后进城的占 40.4%，多数人身份已是城镇户口。

二、长春市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现状^①

笔者通过对长春市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分为经济性隔离、自愿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三大部分。

（一）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现状分析

经济性隔离是笔者在研究进程中根据实证研究状况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关于隔离问题研究涉及经济方面的一般用的是“居住隔离”这个概念。但在研究进程中，笔者发现，失地农民经济方面的隔离不仅仅包括居住隔离，还表现在生活水平、就业状况和消费能力等方面，唯有“经济性隔离”的概念能体现其全部内容。

笔者将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和生活现状是衡量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的基本指标。

1、居住环境方面

失地农民居住环境方面的考量主要反映失地农民的居住隔离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出于敏感性的角度考虑，笔者并没有设计指标反映居住隔离问题^②，而仅仅根据观察对居住隔离的外部表征进行考察。

居住隔离的外部表征指的是能够体现出不同阶层住宅区之间差异及特征的一些要素，主要包括房屋质量、住区环境品质、公共配套设施和物业管理水准等要素。

房屋质量是居住隔离最直观的外部表征。目前长春市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建立独立小区，原有的一个或若干个村庄的村民组合居住；一种是混合居住，在一个新建的小区内单独划出几栋楼作为原村民的安置楼，又叫回

^① 此部分所运用的数据和访谈资料以及一些观点，由笔者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郑沪生研究员合作讨论完成。

^② 失地农民的居住隔离问题的分析必须通过与当地城市市民进行对比分析，在问卷的设计上，就必须涉及住房质量、房屋价格等方面的指标，这就牵涉到对失地农民征地补偿等方面的问题。征地补偿和住房安置等是失地农民群体中非常敏感的问题。在笔者进行前期的访谈工作时，曾因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引起许多冲突和麻烦，比如失地农民的激愤态度和小区管理者对笔者的驱赶等。所以，在进行问卷设计时，笔者有意识的回避了这方面的问题。

迁楼。在笔者的调查小区内，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 W 小区、S 社区和 F 社区。W 小区于 2003 年建成，距笔者调查的时点仅仅 4 年不到的时间，小区住房已经比较破败。楼房的外层刷的是质量低劣的墙漆，到现在已经看不出本色，而且墙皮大块脱落。与 W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墙之隔的国税小区，瓷板外层的小楼在阳光的照耀下映射着破旧的回迁小区。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 X 社区和 J 二区。这两个小区是属于混合居住类型。当笔者在这两个小区进行调查时，向社区居民询问回迁楼时，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问，只要发现墙皮脱落的、外表破旧的肯定就是回迁楼。”在同一个小区内同一批次建立起来的楼房，回迁楼的质量明显低劣。

住区环境主要指住宅区的自然环境。安置失地农民的住宅区环境脏、乱、差，进入其境犹如身在远离城市的乡村，让人无法想象这是现代化都市的社区；而一墙之隔的市民商品楼住宅区环境整洁、干净，小区绿化带修剪得很漂亮。

公共配套设施包括住宅区内部和周边的商业、教育、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停车等设施的完善程度和服务水准。失地农民的安置小区一般离市中心的商业圈较远，周边的饭店等装修简单，价格相对低廉。小区内很少有娱乐、体育设施等。失地农民在闲时总是围堆而坐聊天或是晒太阳。

物业管理水准即物业管理标准、物业管理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住区档次的一项重要内容。回迁小区的物业管理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由于经济的窘境，失地农民不愿意缴纳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处与住区失地农民关系非常紧张。

2、经济收入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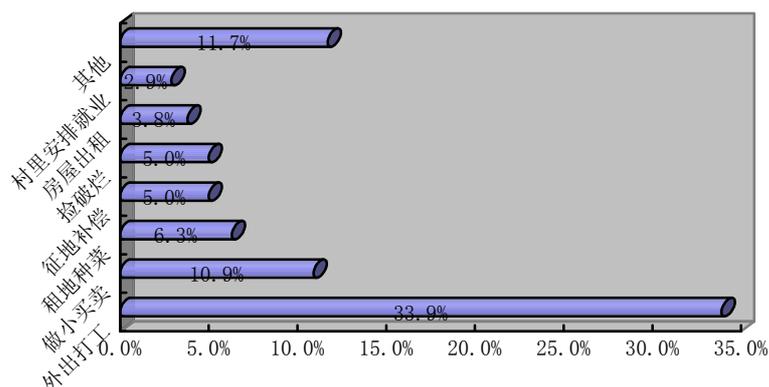
经济收入相对城市市民和失地前收入普遍较低是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的重要表现，也是导致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春市城郊农民绝大多数是菜农，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蔬菜和兼营其他副业，经济收入要比远郊农村种粮农户高得多。据我们对 S 社区、F 社区、T 新村失地农户的调查，失地前普通农户一般年平均纯收入为 2 万元，有的农户年收入可达 3-4 万元。征地后，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进城后经济收入普遍降低。S 社区的程老伯失地前是村里种菜的好把式，家里有两个塑料大棚，种 3 亩多地，平时自家吃菜不花钱，年纯收入有 2 万多元，生活较富裕；失地后程老伯“英雄无用武之地”，没地种了，又没进城打工的经

验，没什么经济收入来源，只得靠一点征地补偿款维持生活。在调查中，对失地前后的经济收入状况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认为收入“降低很多”的占调查对象的 64.6%，“降低不多”的占 8.9%，有 15.6%的调查对象认为失地前后经济收入没变化，只有 8.4%的表示失地后经济收入“提高一点”。

笔者对失地农民的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进行了调查，具体数据见图表 2：

图表 2 失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



数据显示：33.9%的失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30.1%的人“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方式有“捡破烂”的占 5.0%，“房子出租”的占 3.8%，还有 5.0%的靠“征地补偿款”生活。

3、就业状况

国家就业统计调查表明，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与其他群体相比较，都存在着相对较高的失业比率。在全国范围内，失地农民“失地无业、隐性失业、就业再失业”现象呈普遍化趋势，据我们对长春市城郊失地农民就业现状的调查，有 30.1%的农民在失地后没有实现就业。而在实现再就业的失地农民中，主要是靠“自谋职业”，占调查总人数的 67.9%，“村委会安置”的占 2.3%，由“征地单位安置”和“政府安置”的各占 4.2%。“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主要是在长春打工或从事个体经营，靠近城区的村民则靠出租房屋，或经营一些小本生意。

在 X 社区我们采访了一对 40 多岁的中年夫妇，据他们说：村里征地后，他们被征地单位安置在一家小企业上班，工作不到 2 年企业经济效益不好，他们夫妇都下岗了。后来就利用自己住的一楼房屋开了一个小旅店，现在每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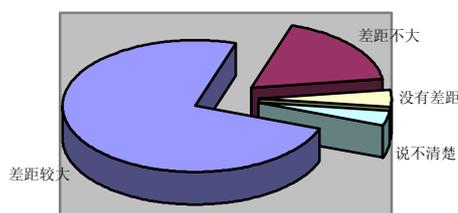
800-1000 元左右的收入，这点收入供一个孩子上高中，勉强维持生活。

由于受文化、技能、年龄等因素限制，大部分失地农民就业难，就业能力弱，就业率较低。尤其是 40-50 岁失地农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除农业以外缺少其他方面技能，扔掉锄头什么也不会干，不会经商，又干不了强体力活，一些人失地后长时间陷入失业境地。即使再就业后，其就业岗位替代性强、工作周期短、职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这就容易导致失地农民再就业后时刻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危机，成为二次失业人群。

4、生活状况

经济收入和就业状况决定了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在调查中有 66.4% 的失地农民认为“生活水平降低了”，85.9% 的认为现在“赚钱比以前难多了”。有 74.5% 的人在回答“您目前的生活水平与城里人相比”中，认为“差距较大”，而认为“差距不大”的仅占 17.6%。

图表 3 失地农民目前生活水平与城里人的对比分析



在农村，同村居民之间生活水平差距不明显，当人们把同村居民作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群体时，并不感到生活差距的明显。但进城后，空间距离的变化使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居民处在同一地理位置和同一户籍身份体系中，当失地农民把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时，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就会在他们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在个案访谈中，失地农民普遍感到进城后的生活低于原来在农村生活的水平。J 小区 50 多岁的失地农民郑大娘说：“我们和城里人比是很自卑的，没什么经济收入，什么东西都不敢买。不怕你们笑话，超市我都不敢进，没钱你进去干什么？平时买菜，我都等到快收摊了，才去买点贱的菜。”

在一些失地农民回迁安置小区，有些农户因无力承担入住新房时的各种费

用，而把新房出租出去；有的甚至把新房卖了，自己搬到附近或长春市远郊的新立城、大南等地租房居住，有的搬迁到更远的农村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维持生活。有些当年入住的农户，现在也因不堪经济重负有的已经把房子卖掉了，也有的正在准备卖房。一些失地农民回迁小区的楼栋前，随处可见高高堆放着的破纸壳、一堆堆的旧饮料瓶、酒瓶等杂物，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靠拾荒度日，他们已经沦为城市新贫民。

（二）失地农民自愿性隔离现状分析

自愿性隔离包括失地农民与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隔离和心理隔离，是失地农民在文化生活与身份认同等方面的隔离。它是失地农民群体自愿与城市市民群体相分离的过程。失地农民群体成员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城市市民群体相处，他们就通过这一过程努力限制与群体外成员的接触。鲍曼认为，自愿性隔离“并非一种真正的隔离……它的首要目的是，阻止外来人的进入——而内部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进入。”^①所以，失地农民的自愿性隔离是一种出于安全需要的自我保护措施，“他们在这个围场内感到安全”^②。失地农民的自愿性隔离主要体现社会交往隔离和心理隔离两个层面。笔者将社会交往层面的隔离指标设定为社交范围和求助体系，而将心理隔离的指标设定为身份认同。

1、社会交往的自我封闭化

中国是一个人际关系本位的社会，人际交往在城乡社会生活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城市生活方式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价值的，城市社会交往关系以业缘为基础，人们生活在相互交错的组织之中，并通过它们参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体现着城市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农村社会结构以地缘、亲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人际关系主要是亲族和邻里，进行着熟人间的互动，社会交往半径较小，传统习俗维系着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有较强的的群体归属感。城乡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决定了失地农民进城后将面临着完全陌生的环境，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农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社会交往主要以亲缘、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因此通过社会交往网络情况的了解，可以较客观地反映出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状态。在调查中，我们按照社会学意义上的

^① 【英】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36-137

^② 【英】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37

划分法，把社会交往群体分为亲缘网络、地缘网络和业缘网络三种类型，在调查问卷设计中将“亲戚”（包括配偶和父母）作为亲缘网络，把“乡邻”（包括同事、朋友）作为地缘网络，把“城镇居民”和“社区干部”、“乡村干部”作为业缘网络^①，通过对失地农民进城前后社会交往关系的比较，分析他们进城前后社会交往网络的变化。失地农民进城后原有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解体了，但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依然发挥着作用，他们交往的对象更多是自家的亲属或乡邻、或同村的农民，与小区的城市居民很少来往。

图表 4 失地农民进城后社会交往状况（%）

人 群 \ 程 度	经常来往	交往较多	很少交往	有事才来往	从不来往
(1) 亲戚	42.8	19.8	26.1	9.9	1.4
(2) 乡邻	27.6	26.7	33.5	9.0	3.2
(3) 乡村干部	2.3	22.4	30.8	44.4	0.1
(4) 社区干部	0.5	2.3	14.0	36.7	46.5
(5) 城市居民	4.6	9.2	28.1	13.4	44.7

数据结果反映：失地农民进城前后社会交往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以亲缘关系为主，“经常来往”、“交往比较多”的主要是亲戚和乡邻。

我们所调查的 X 社区位于长春南部的城乡结合部，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长春市安置回迁失地农民的聚居地之一，社区现有 8000 多住户，2 万多人口，其中失地农民回迁户约占一半。小区有 4 栋楼集中安置的是原幸福乡几个村的失地农民，大家原来也不认识，住进小区后彼此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互相交往增多了，他们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与城市居民没有来往，只生活在有限的空间与自己人的圈子里。小区城乡居民有着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边界。

2、社会求助体系仍以亲缘关系为主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经济的、心理的、情感的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它构成了人们寻求社会求助体系的主要内容。社会求助体系是社会支持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社会生活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在帮助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和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在渡过难关缓解生活压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失地农民在农村生活长时间积淀形成的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惯习，仍然影响着他们

^① 此分类法借鉴郑杭生的社会关系分类法。郑杭生认为，社会学通常从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上将社会关系区分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他认为，血缘关系是以血统的或生理的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地缘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区位结构关系或空间与地理位置关系，业缘关系是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

们的社会生活习惯，而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循规性行动，即“社会群体的成员依据共同的价值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只要在规范适用的情景，个体行动者就遵从（或破坏）规范，规范代表了群体所取得的意见一致。”^①

农村是熟人社会，熟人之间互动频繁、互助性强、可信度高，这与农村社会生活环境相关，农村居民彼此都有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村民居住地空间距离较近，亲缘关系和空间距离越近，越容易被要求提供社会支援。调查数据结果反映：失地农民进城后，适应城市生活的社会求助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原来的社会求助体系仍发生着影响，他们在遇到困难时求助对象仍以亲缘关系为主，主要是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在遇到困难时第一位求助的对象是父母兄弟姐妹，占 87.7%，第二位是亲戚，占 47.0%，第三位是朋友/老乡，占 41.9%。根据笔者 2005 年在长春市社区居民基本状况的社会调查，城市居民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邻居（83.2%）、家属（47.2%）和社区居委会（41.8%）^②。从城乡居民求助对象的比较中可见，城市居民的求助关系具有社会化因素，失地农民的求助对象仍然限于原有的社会资本，主要靠父母、亲属，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别。由此可以看出，失地农民进城后社会求助体系主要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求助对象与农村原有的社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虽然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处在城市生活的边缘，还没有建立起具有城市现代因子的社会支持网络。

3、对身份认知的模糊性

“当社会个体或群体背景发生变化时，他们在原有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状态就变成一种心理背景，而在新环境中出现的心理反应首先落在这个心理背景上。这时候，如果新环境中的心理反应同心理背景协调，就是这个社会个体或群体对新文化背景的适应。否则，心理活动不协调，就无法适应新的环境。”^③

身份认知是衡量个体融入主体社会程度的一个标志，没有对身份的认同，社会角色意识就会缺位，也就没有与社会角色相适应的行为。对失地农民而言，身份认知是他们能否积极融入城市的关键，“我是谁”、“我的位置在哪里”，这是失地农民进城后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在城乡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要重新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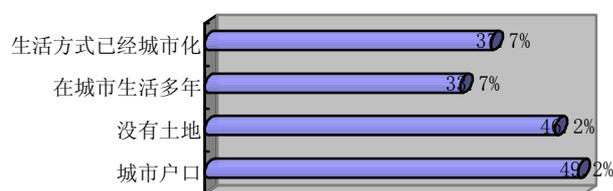
^① 黄陵东.人类行为解读：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理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4).

^② 2005 年，笔者受长春市民政局的委托，在长春市作了一次城市居民社会调查，本处所用数据为此次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

^③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411.

定自己的身份，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失地农民进城后生活场域与时空情境发生了剧变，进城期望和城市体验深切地影响着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曾经的乡土记忆与农村生活养成的惯习是他们对自己身份认知的基础。乡土记忆指的是失地农民曾经在农村的生活、生产经历。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奇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在被征地前，农民一直习惯于户籍制度为他们安排的农民角色的扮演，这种社会角色在心理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很难改变对自己农民身份的认同。实践证明，农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越长、经历越丰富，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以及农民身份的认同则更坚定。在调查中，有 61.6% 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现在还是“农村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原因中，在“生活方式上我还是典型的农村人”的占 64.6%， “愿意让人知道我是农村人”的占 61.6%。也有 38.4% 的人认为自己现在是“城里人”。认同自己是“城市人”的主要原因是，有“城市户口”(49.5%)、“没有土地”(46.2%)、“已经在城里生活很多年了”(33.7%)、“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了”(38.7%)。

图表 5 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原因



无论认同自己身份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他们认同的基点都是对户籍关系、土地和生活方式的评价。赵大伯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我干了一辈子农活，祖祖辈辈好几代都在农村，乍一进城很不习惯。说是农村人吧，我已经没地了，也不干农活了，户口都换了。说是城里人吧，我们生活习惯还和在农村时一样，该咋过日子就咋过，只是没有地种了，其他什么也没变化。你们说我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呢，我自己都不知道。”田大娘说得更直白：“啥农村人城里人的，户口变了管什么用呀，老农民到啥时候都是农民。”从调查中可看出，失地农民已成为“双重边缘人”，说他们是城市人，他们除了有城市户口外，在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都与城市人有明显的差距；说他们是农村人，他们已失去了土地，对农民而言，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做农民资格，因此他们很难再把自己确认为农

民。许多人很困惑地说“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失地农民与农民工都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移民群体，但农民工是主动进入城市谋求发展，如果在城市生存不下去，他们可以退守农村，在那里他们还有一块可以保障生存的土地；而失地农民则是被动进城，他们只能去适应城市而毫无退路可言。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失地农民的三大层面的社群隔离中，自愿性隔离是其根本。而且，这种隔离，“具有一种让他们的隔离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剧的可怕的能力”^①。

（三）失地农民制度性隔离现状分析

制度性隔离这一概念也是笔者在研究进程中提出的新概念。笔者发现，在所有失地农民隔离状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制度因素。

学术界在研究社群隔离问题的时候，一般将社群隔离分为三种类型，即区位性隔离、自愿性隔离和非自愿性隔离^②。笔者在进行本研究的时候，为了突出失地农民在经济层面的弱势地位以及经济的弱势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在前文着重论述了失地农民的经济性隔离，把区位性隔离即居住隔离当做经济性隔离的一个内容。一般说来，非自愿性隔离是在人们不情愿的情况下产生的，当一个群体被法律或习俗指定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就产生了非自愿性隔离。^③但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并未发现有因习俗而产生的非自愿性隔离的存在，而是发现制度或法律不仅对失地农民隔离现象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笔者在这里采用“制度性隔离”的提法，以突出制度对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失地农民的制度性隔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二元社会结构下的社会拒斥

我国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开始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体制，国家发展的指导思路实质上是“重城市轻农村”，城市中心主义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社会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对城乡社会实施隔离。

有研究将“农民工”作为一个可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身份类别，同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类别这是中国近 20 年来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由制度与

^①【英】鲍曼.共同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38.

^② 郭星华.社群隔离及其测量[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23-25.

^③ 郭星华.社群隔离及其测量[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2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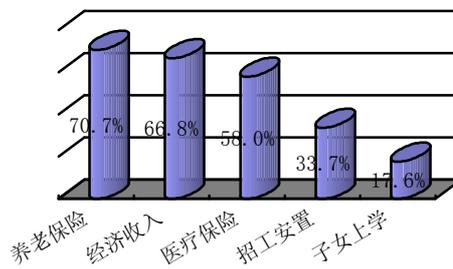
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①。笔者认为，在城市化扩展的进程中，失地农民已经成为由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除“农民”、“城市市民”和“农民工”外的第四种身份。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城市政府成功地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移植、复制于城市内部。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在现有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失地农民成为事实上的“城市里的非城市人”，即制度意义上的“非市民”。

在这个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下，失地农民处于城市人群的边缘地位。城市市民由于其对“农民群体”固有的刻板印象，对失地农民抱有一定的拒斥情绪。在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笔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城市居民，他们通常称失地农民为“坐地户”，认为他们素质很低，是社区社会治安不稳定的因素。市民乔某对笔者说：“小区里的这些‘坐地户’虽然住在楼里，但他们还是老屯（农村人）的生活习惯，没事就喝酒、打麻将。我们基本不与他们来往”。市民张某说：“我们小区里的社会治安问题主要是他们（失地农民），社区环境卫生难治理也是他们，他们和城里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居民是一等公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城市人的优越感，城市居民通常称农民为“屯老二”或“屯二迷糊”，反映出城里人对农民的歧视心态，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由于失地农民处于弱势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缺少与市民生活中的互动，失地农民普遍与市民存在着一定的疏离感。

失地农民在进城前对城市生活有很高的心理预期，在进入城市生活的初期阶段，对城市也有很高的认同和依恋感。据笔者调查，有 51.9%的人“很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有 56.8%的人表示“既然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对进城市生活表现出较强的愿望。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长期以来一直以城市发展为中心，财政投向偏重城市发展，城市居民享受到较完善的社会福利，而农民在土地被征占后得到的只是一次性土地补偿，政府并没有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享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待遇，他们成为城市管理体制下的“二等公民”，在城市生活缺少发展的能力，与市民生活落差较大，与城市产生距离。据调查：有 74.5%的失地农民认为生活水平与城里人相比“差距较大”；有 86.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些不平等的待遇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经济收入、医疗保险等方面。

^① 陈映芳.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 社会学研究, 2005(3).

图表 6 失地农民认为与城市居民不平等待遇的表现



2、现有征地补偿制度下的公平偏离

征地已经成为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途径，已经成为农民最不满的一个领域。现有的征地补偿机制对失地农民而言，缺乏应有的公平和正义，主要表现在经济补偿标准偏低且不统一，土地的增值享有权被剥夺。

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①。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这个国家标准，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进行征地补偿，可是征地地区一般都是城郊农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因此，根据此标准确定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失地前多为菜农，每亩菜地平均每年净收益4万元，按照“产值倍数法”的最低倍数估算征用土地补偿费应为每亩24万元，可实际上目前为止最高补偿标准为每亩11万元，明显偏低。

同时，各地规定的补偿标准不一、高低相差悬殊。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高的每亩达11万元，低的仅几千元，甚至同村同组由于项目用途的不同，同类地块的安置补偿价格也不尽相同，差异很大。另外，征地补偿政策变动不一，征地时间越早补偿标准越低。这就造成由于征地时间不同补偿标准的差异，甚至出现同一村落有好几种不同补偿标准的局面。

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

^① 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施行，第五章，第四十七条。

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①。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实行“涨价归公”的原则，报价之后地价上涨时，国家通过土地增值税将上涨部分收归国有。这就剥夺了失地农民获得土地增值价值的权利。

现有征地补偿制度是导致失地农民陷入经济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笔者的调查中，获得补偿最少的是 X 社区的失地农民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获得大约 9000 元每亩的一次性征地补偿款，最多的是 T 新村的失地农民在 2003 年获得 11 万每亩的一次性征地补偿款。T 新村的刘老伯忧郁地向笔者陈述：“征地前我主要弄大棚种蔬菜，每亩地每年收入 4 万多，虽然累点，但每年都有个盼头。现在每亩一次性只给我 11 万，这钱用完了以后我靠什么生活？”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在花光以后，加上就业困难，收入偏低，失地农民生活日益窘迫。

3、社会保障制度缺位下的未来焦虑

农民与土地是“血溶于水的关系”。土地是农民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拥有土地是农民与社会其他人群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农村家庭的核心秉性。由于农民拥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来自于土地的收入成为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家庭保障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也是农民最后的一道生活保障^②。对农民而言，土地实际上承担了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农民的生存保障依据，或者说是生存保障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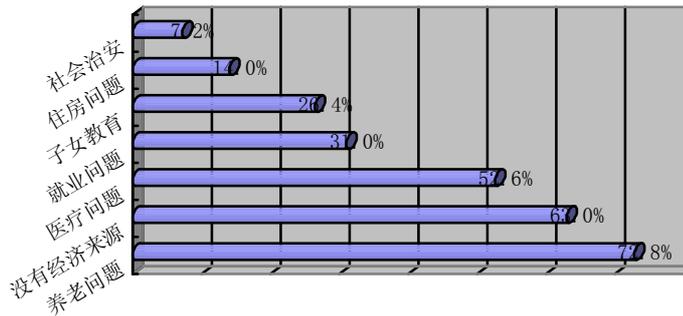
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重要的生活保障。但在现阶段，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是空白，多数失地农民成为城镇居民后，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的救助范围，就业、社保等方面未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使他们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得焦虑。据调查，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保障问题感到十分担忧和不满，对未来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调查结果反映出失地农民感到最担忧的三大问题是：养老问题，占 72.8%；经济收入问题，占 63.0%；医疗问题，占 52.6%。

^① 高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经济学家, 2004(1):20-24.

^② 鲍海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管理世界, 2002(1).

图表 7 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所担忧的问题



在调查中，一些年近六旬的失地农民对我们说：“在农村五六十多岁的人还能干点农活，维持自己的生活没什么问题，而现在没有了土地我们还能干些什么呢？上班没人要，打工没技术。现在生活勉强维持，如果遇到生病，生活就艰难了。”还有些靠外出打工、开个食杂店、经营小餐馆等方式就业的失地农民担心就业不稳定，没有失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为将来遇到有病有灾时生活没有保障而担忧。林大娘说：“在农村像我们这样的老人，自己有点地种对付过日子是没问题的。等到种不了地那一天，把地租出去还可以得个 2000-3000 元，可以维持温饱生活。现在没地了，又没有养老保险，今后有病这日子咋过呀？”失地的老年农民正处体弱多病的年龄，他们的生活逐步趋于困难，传统的家庭赡养也面临着种种困境，过去大部分老年人靠种几亩地来解决养老问题，而失去土地后得到的一笔征地补偿费不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充足的生活保障，也不能解决他们今后的持续发展问题。失地农民虽然在户籍关系上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但却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关涉他们未来的生活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影响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

三、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负面效应及破解思路

（一）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负面效应

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存在，可能导致以下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

1、相对剥夺感下的社会动乱危机

社会学理论解释剥夺时，不是指剥夺的行为，而是指被剥夺的一种状态^①。

^① 李强.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J].学术界, 2004(4).

其中一方面，是指客观的经济被剥夺状态，另一方面，是指被剥夺者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即人们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一种状态。这两种状态来源于两类剥夺形式：一是绝对剥夺，一是相对剥夺。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失地农民所感受的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是指在与其它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或个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这种“相对满足”或“相对剥夺”现象揭示了参照群体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影响作用。^①

经济性隔离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直接原因。在农村，同村居民之间生活水平差距不明显，当人们把同村居民作为自己生活的参照群体时，并不感到生活差距的明显。但进城后，空间距离的变化使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居民处在同一地理位置和同一户籍身份体系中，当失地农民把城市居民作为参照群体时，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就会在他们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制度性隔离加剧了失地农民相对剥夺感。“制度上的区隔与另类标签，同样也带来了资源配置的藩篱与偏颇”^②。与城市市民相比，失地农民不能获得足够而且合法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以及文化资源。就业资源、子女教育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社会基本的权利资源等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与不公平性不断恶化失地农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境遇，加剧了失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格尔“递减性的剥夺”（decremental deprivation）理论认为在“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并没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完成这些期望的能力却不断下降”^③的情况下，个体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断增强，他们感到失去了他们曾经得到或者认为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反抗因而产生。

长春市的失地农民安置基本上采取的是集中居住的模式。这样，由于经济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由单一群体——即失地农民组成的社区，这种社区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限制该社区居民生活机遇的障碍。同时，根据上文的分析，生活在这种社区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呈现自愿性隔离的状态，人际互动限于狭小的区域内，缺乏与外界的信息沟通，最后逐渐形成相对封闭的社区。在这种封闭社区的周围，是一个个反差很大的高档封闭社区，在失地农民困苦生活的视界里，是城市市民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这种强烈反差，“甚至产

^①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4.

^②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8.

^③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8.

生对抗社会主义文化的群体亚文化，因此而成为骚乱和其他形式集合行为的发源地”^①。

2、孤岛经济效应下的社会不平等的强化

潘泽泉在“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研究中，在分析流动农民工的基础上，提出了“孤岛经济效应”的概念^②。笔者认为，在失地农民群体中，这种效应同样存在。

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的主观意愿，被现实生活中的经济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现象破灭之后，失地农民的内心产生出对城市社会的反感和排斥，他们很少与城里人交往，担心被城里人看不起，觉得与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才是安全的，久而久之，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生活圈子，即形成狭小的社会交往的社群组织以及较为封闭的心理结构，形成一个“自愿性的隔离区”或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这样，失地农民就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受保护的孤岛上，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产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节”^③。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生活在相当拥挤的都市环境中的人们，如果已经建立起的良好稳定的社会网络，那他们并不必然地对他们的邻里有较多的不满意，而处于最直接隔离状态的人们则易于产生不平等感。^④失地农民的住宅区紧邻高档小区，一墙之隔的高档社区中的绿化、硬质场地、儿童设施和体育休闲设施与自己居住社区的住宅破旧、设施简陋形成鲜明的对比，时时不断地提醒失地农民所处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地位。

马歇尔·萨林斯指出：“贫困并不一定是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有什么，但他们并不贫穷。贫穷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和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⑤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现象的存在，强化了失地农民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3、社会流动固化下的社会分层结构刚性化

彼特·布劳将社会结构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所组成的多维空间，人们的社

^① 郭星华.社群隔离及其测量[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11):23-25

^② 潘泽泉.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J].浙江社会科学, 2007(2):101

^③ 潘泽泉.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J].浙江社会科学, 2007(2):101

^④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208

^⑤ 卢周来.穷人经济学[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73

会交往既提供了区别社会位置的标准，也展示了社会位置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使得社会位置成为某个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①他认为，不管引起变化的条件是什么，在大多数结构变迁形式中，社会流动过程是一个基本要素。从广义上看，社会流动的定义包括人们在社会位置之间的所有流动，不仅包括职业流动和迁移，而且还包括宗教信仰的改变、结婚、收入的增加、失业以及政治联盟的变化，朝一个方向的过量流动会改变人们在各种社会位置之间的分布，因此会改变社会结构。^②社会流动还涉及到人们从一个群体或阶层向另一个群体或阶层的转移。这些转移或流动的程度在相对方向上可能是相同的，不会引起人口分布的变化；或者是不一样的，因而会改变人口的分布。此外，与其他群体和阶层的交往推动和促进向这些群体和阶层的流动。^③

但是，不同群体与阶层的社群隔离却使这种社会流动变得困难，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导致这种社会流动机制固化。这是因为失地农民在经济性隔离和制度性隔离下的影响下，改善社会地位的机会如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业机会和职业培训机会的丧失。信息条件的不对称、经济地位的悬殊，使得失地农民与城市市民处于不平等的起跑线上。

威尔森在其贫穷集中理论中指出，由于有工作的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旧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这样，失业者或穷人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尤其是缺乏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导致弱劳动力联系，进一步恶化了失业者或穷人再就业的可能性。^④失地农民同样也是处于这种困境，由于失地农民群体的集中居住，且与城市主流社会脱离，使得自己的生活半径局限在自己的、具有同质性的空间中，形成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影响了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而且，由于社群隔离的原因，失地农民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获得的有效社会支持不多，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比较少，所获得的信息也就只是局限在寄寓在同一个空间的邻里圈子里，具有信息的同质性，且信息质量不高，只能获得过剩的工作信息和市场，不利于职业的流动，而且在地位获得中，难以联结不同的等级地位层次，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累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的向上流动。

^① 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8-9

^② 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19

^③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210

^④ 威尔逊.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59-178

缪尔达尔在《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一文中指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隔了他们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力人物的掌握之中”^①，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控制，多少也是我国社会面临的现实写照^②，这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将更加刚性化。

（二）社会融合视域下社群隔离问题的破解

在当前学术界，社会融合是一个引起人们强烈兴趣且伴随激烈争议的概念。总体而言，关于社会融合的以下几个观点取得了更多社会融合研究者的一致意见：（1）融入不是一个静态的事情，它是一个对现状一直进行挑战的动态过程；（2）社会融合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3）没有人可以通过强制力量达到社会融合，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主观性的融入；（4）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融合、政治融合、社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以及心理融合；（5）社会融合是多层面的，既有全国范围的社会融合和城市范围的社会融合，又有跨国家的区域社会融合，既有宏观层面的社会融合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融合，也有微观层面的社会融合。^③

在社会融合的理论视角下来审视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容纳还是排斥的问题、社会歧视和社会冲突的问题、边缘化和社会整合的问题。在社会融合视域下寻求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破解途径，就变成了如何实现失地农民与城市市民的社会整合问题，如何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城市劳动力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提供收入支持的问题，是他们在城市中如何发展，如何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如何获得一种归属感、幸福感的问题。在社会融合的理论视野下，就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破解思路问题，笔者提出三个建设性的意见：

1、改变失地农民的经济弱势是破解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基本前提

是否能实现经济的同步融入是失地农民获得生存权利的最基本条件^④。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失地农民一般是低技能、低收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① 卢周来.穷人经济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73

^②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210

^③ 嘎日达、黄匡时.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J].国外社会科学，2009（3）：23

^④ 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不论穷人的公民能力和政治能力如何不行，他们都有生存的权利。因此，精英阶层或国家对农民的索要，一旦侵害了农民的基本需求，便无公正可言。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41

他们在经济上一般处于劣势。“贫困和孤岛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机会、信息贫乏、与主流社会脱节，处于一种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①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社会融合如不能从经济上实现同步发展，社会融合只能是一种空想。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实现经济的同步融入，改变其经济弱势地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举措：

首先，建立和完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使失地农民具备脱离经济性隔离的原始资本。中国城市化是在政府引导和规划下进行的，政府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征用了大量的农地。在征地中，政府对农民的补偿往往采取一次性补偿的办法，补偿费标准较低，不足以保障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活，或自主创业的资金，失地农民管这种补偿叫“一脚踢”。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必须实践科学发展观，强化政府责任，发挥政府职能作用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政府首先要改变“一脚踢”的征地办法，不能让农民“光着身子进城”，要建立健全的征地制度，以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征地程序保障农民获得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政府征地要在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征地双方平等协商基础之上，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并对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作出系列安排，做好征地后的善后工作。

其次，对失地农民进行较为有利的环境转换，使其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帮助失地农民获得工作、提高他们的技能、培养他们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是破解失地农民经济性隔离、改变其经济弱势、真正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必须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就业体系，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能够持续，为他们再就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要有计划、有目的的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就业培训力度，提高就业率；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为失地农民提供政策优惠，促成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建立城乡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范畴，建立失地农民就业的长效机制，避免出现就业的短期行为，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二次失业问题；要制定帮扶失地农民再就业的政策，把对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安置的政策扩大到失地农民，为他们提供一定的社会公益岗位。政府要把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区、县和乡级政府要建立

^①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3-434

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就业培训的机构,根据不同年龄、文化层次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和发展能力。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以优惠的政策鼓励、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建议政府建立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基金制度,对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在资金上给予必要的扶持。

2、获取城市市民的心理认同是破解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重要条件

使失地农民获取城市市民的心理认同,换句话说就是使失地农民最终将城市市民身份作为自己的心理归宿,即实现城市社区的归属感和实现情感归依。包括社会认知、身份融入以及文化融入等。“认同意味着接受某种社会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系统,承认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并归属于其中”^①。要使失地农民获取城市市民的心理认同,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提高失地农民的社会参与度,包括政治、经济、组织和城市发展战略等的参与。“实现社会融合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参与,只有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融合。”^②所以,在实现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破解其自愿性隔离的过程中,应注重失地农民的社会参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来实现社会融合。

其次,改善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实现其社会网络在城市中的重建,充分利用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在中国,社会网络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资源,是获取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包括信息、互惠和稀缺资源的提供等。从这个角度看,失地农民的社会融合是指失地农民在价值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市民的趋同性。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失地农民现有的社会网络主要以原有农村系统为主,主要集中在亲戚、朋友和邻居等血缘或地缘网络关系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当前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决定。当前各级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主要采取集中居住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失地农民进城后的交往圈依然以村民为主,严重阻碍了失地农民新的社会网络的建立。为此,笔者建议采取混合居住的安置模式,克服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空间障碍,增加交往机会。同时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消除失地农民与城市市民的心理隔膜,真正实现社会融合。

^①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6

^② 潘泽泉.社会、主体性与秩序: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34

3、平等合理的制度安排是破解失地农民社群隔离的根本途径

失地农民社群隔离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追溯到社会政策和政府层面，即平等合理的制度安排。我们应该尽量取消那些造成城市区隔与另类标签的社会政策与制度，使政策和制度时时刻刻注意到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状况与需要，从他们的利益出发。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个途径：

首先要提供无差别的优质公共产品服务。失地农民破解制度性隔离的根本途径，有赖于在特殊治理体制下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城乡分割、城市优先的利益结构的整体全面的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从以前的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以前的城市优先走向城乡统筹兼顾，实现工农平权，消除市民和农民之间基于身份的不平等。在实现城乡一体、工农平权的基础上，政府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服务，这样，无论身份是工人还是农民，作为国家的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法定的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普遍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无差别的保护。^①

其次是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失地农民完全失去土地时，就已经和城市居民没有本质的区别了，他们一样得承受市场经济下存在的巨大风险，因此，有必要为失地农民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首先要将失地农民纳入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给予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要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让他们与市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共享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公共资源。其次建立和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在内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现阶段我国商业保险的费用较高，不适应失地农民的经济承受力，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要以“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为原则，降低投保费用，建立面向失地农民的特殊社会保险体系，在保障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切实提高社会保险覆盖面。广覆盖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享受社会保障，这是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先目标。再次是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专项基金，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的相关问题，着力解决由于政策不完善造成的早期失地农民生活困难的救助问题。

结 语

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消除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实现社

^① 邹英.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社会学分析——以长春市为例【D】.吉林：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07.

会融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阿瑟·奥肯曾经说过：“社会虽然不能制止老天下雨，但可以生产雨伞”，借用这句名言，“社会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不平等和社群隔离的存在，但可以通过融合的手段加以改善”^①。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社会与经济的双重转型，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加上我国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各团体根本利益出现了多元化格局，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冲击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失地农民的社群隔离问题的出现正是其生动写照。但消除社群隔离，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凸显，社会融合是消除社群隔离、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途径，也是社会的终极目标。

^① 黄怡.城市社会分层与居住隔离[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234

参考文献

- [1] John G, Edited by Bruhn.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Connections[M]. Kluwer Academic Pub, 2005.
- [2] Edited by Nancy N. Chen. China Urban[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Sako Musterd. Segregation, urban space and the resurgent city[M]. Edinburgh:Urban Studies. 2006.
- [4] Massey, D. S, and Denton, N. A. American Apartheid: Segrega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Massey, D. S. and Denton, N. A. Trends in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Blacks, I-Ispanics, and Asi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2).
- [6] 【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 真正的穷人: 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 【美】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英】斯科特·拉什, 约翰·厄里. 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9] 【美】爱德华·W·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英】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英】布赖恩·特纳. 社会理论指南(第二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美】麦克·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3] 【美】彼特·布劳. 不平等和异质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14] 【加】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6.
- [15] 【法】H.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6] 【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 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17] 【法】米歇尔·米绍主编. 法国城市规划 40 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18] 【美】W.L. 托马斯、【波兰】F. 兹纳涅茨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19] 【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 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M]. 北京:世纪出版社, 2005.

- [20] 【法】阿兰·库隆. 芝加哥学派[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21] 【英】鲍曼. 共同体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22] 卢周来. 穷人经济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 [23] 詹姆斯. C. 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24]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411.
- [25] 李友梅等. 社会认同: 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6] Roy. L, 施鸿志, 李嘉英译, 于宗先主编. 经济学百科全书第 8 册空间经济学[M]. 台湾: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 [27] 吴启焰. 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28] 刘玉亭.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9] 丁元竹. 中国社会保护网的再造.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30] 潘泽泉. 社会、主体性与秩序: 农民工研究的空间转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31] 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 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32]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33] 黄怡. 城市居住隔离的模式[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2).
- [34] 黄怡. 住宅产业化进程中的居住隔离[J]. 现代城市研究, 2001(4).
- [35] 吕露光. 从分异隔离走向和谐交往——城市社会交往研究[J]. 学术界, 2005(3).
- [36] 刘精明、李路路. 阶层化: 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J]. 社会学研究, 2005(3).
- [37] 徐晓军. 城市阶层隔离与社区性格[J]. 社会主义研究, 2007(1).
- [38] 钱志鸿, 黄大志. 城市贫困、社会排斥与社会异化: 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4(1).
- [39] 王兴中. 对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本体解构[J]. 人文地理, 2003(3).

- [40]潘泽泉. 社会分类与群体符号边界: 以农民工社会分类为例[J]. 社会, 2007(4).
- [41]苏振民、林炳耀.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控制: 居住模式与公共政策[J]. 城市规划, 2007(2).
- [42]郭星华、储卉娟. 从乡村到都市: 融入与隔离--关于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 江海学刊, 2004(3).
- [43]黄怡. 大都市核心区的社会空间隔离: 以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3).
- [44]郑传贵. 当前我国城市社群隔离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J]. 城市问题, 2003(6).
- [45]孙群郎. 美国大都市区的阶级和种族隔离与开放郊区运动[J]. 东北师大学报, 2004(4).
- [46]李华. 美国的居住隔离[J]. 城市问题, 2002(5).
- [47]郑传贵. 对当前我国城市社群隔离现象的社会学分析[J]. 科技导报, 2004(1).
- [48]张雪筠. 浅析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隔离[J]. 社会工作, 2007(9).
- [49]朱力. 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 江海学刊, 2002(6).
- [50]卢海元. 土地换保障: 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的基本设想[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6).
- [5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 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对策[N]. 经济参考报, 2004-12-22.
- [52]姜长云. 农村土地与农民的社会保障[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2(1).
- [53]风笑天.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J]. 社会学研究, 2004(5).
- [54]郁晓晖、张海波. 失地农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 中国农村观察, 2006(1).
- [55]张海波、童星.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J]. 社会学研究, 2006(1).
- [56]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 [57]朱虹. 打工妹的话语策略与城市适应[J]. 南京大学学报, 2008 (4): .
- [58]陈映芳.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 上海市的调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3) .
- [59]黄陵东. 人类行为解读: 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行动理论[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4).
- [60]陈映芳. “农民工”: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 社会学研究, 2005(3).
- [61]高勇.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探讨[J]. 经济学家, 2004(1).
- [62]鲍海君, 吴次芳. 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 管理世界.
- [63]李强. 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J]. 学术界, 2004(4).
- [64]郭星华. 社群隔离及其测量[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11) .
- [65]黄怡. 城市居住隔离及其研究进程[J]. 城市规划汇刊, 2004 (5) .
- [66]嘎日达、黄匡时.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 (3) .
- [67]介绍 David HaiveS 和他的一本名著[J]. 城市规划汇刊.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8 (1) .

作者简介: 刘杰, 湖南邵东人,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